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

周汝登(1547-1629)，字繼元，號海門，嵯縣人，明萬曆丁丑(1577)進士，屬陽明學派的晚期人物。其最為人熟知之事乃萬曆二十年(1592)前後，與許孚遠(字孟中，號敬菴，1535-1604)在南都會講上的「九諦九解」，在當時引起不小的注意，並成為王學史上不可忽略的論辯之一。¹除此之外，周氏在當時的浙江一地還擁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影響力，如《嵯縣志·人物志》記載周汝登申說九解後：「弟子日益進，執贄者千餘人」²，且《嵯縣志·人物志·儒林》所載錄的明代人物，近半數都是周汝登的弟子或友人，³足以證明周汝登在晚明的浙江嵯縣一地，確實發揚王學並造成影響。此外，當代著名的儒者亦對周汝登傳承、發揚王學有所記錄，如名重晚林且為周氏好友的鄒元標(1551-1624)說：「繼元(周汝登)後龍溪而出者，雙目炯炯，橫衝直撞。所至令人膽落心驚，亦能使人神怡情曠。東越(今浙江)之學，從今益顯益光者，非繼元氏乎？」⁴此段說明周汝登是繼承龍溪(王畿，字汝中，別號龍溪，1497-1582)之學，在浙江發揚王學的重要學者。而稍後的劉宗周(1578-1645)寫有〈祭海門先生文〉，表達對周汝登的景仰之情與未能求教於門下的遺憾：「嗚呼！斯道之不傳於世，蓋千有餘年。而吾越陽明子以良知之說為天下。及門之士，於吾越最著者為龍溪先生；又百年，龍溪之門於吾越最著者為先生(周汝登)。先生於陽明之學，篤信而謹守之。由禰而祖，一嫡相傳。」⁵清楚說明周汝登是王陽明、王龍溪一脈相傳而下，在浙江的重要承繼者。以上資料顯示周汝登至少在浙江一地，被儒者視為是承襲陽明學的第二代重要弟

¹ 「九諦九解」全文載錄於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中，而黃氏對此辯始末說明如下：「南都舊有講學之會，萬曆二十年前後，名公畢集，會講尤盛。一日拈天泉證道一篇，相與闡發，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。明日，公出九條目，命曰九諦，以示會中，先生為九解復之。」見[清]黃宗羲著，沈芝盈點校：《明儒學案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1月第2版)，卷三十六，頁861-868。

² 牛蔭麐修，丁謙等纂：《嵯縣志》(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75年影印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)，第四冊，頁988。

³ 如王三台、袁祖乾、袁祖憲、吳振尹、尹志賡、丁彥伯、吳應雷等皆師事周汝登，吳伯化、吳調元等與周汝登交游。見牛蔭麐修，丁謙等纂：《嵯縣志》，第四冊，頁1001-1012。

⁴ [明]鄒元標：〈東越證學錄序〉，[明]周汝登：《東越證學錄》(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0年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[明]萬曆卅三年(1605)刊本)，頁18-19。

⁵ [明]劉宗周：《劉宗周全集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6年)，頁1060。

子，足以說明周汝登在當時的重要地位與影響力；另外，資料描述周汝登承繼王龍溪之後，出於龍溪之門，此與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中敘述周氏師事羅汝芳有所出入⁶，關於此師承問題，今已有彭國翔等人撰文進行澄說釐清⁷；筆者參考彭氏等文，再根據周汝登屢稱王龍溪為先師的記載，⁸認為周氏師承王龍溪應是較為近真的說法。但無論是師事王龍溪或羅汝芳，都無法抹煞周汝登為陽明後學中重要人物的身份，尤其在浙江一地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地位與影響力。

周汝登一生的著作除了著名的〈九解〉一文之外，還有《程門微旨》、《東越證學錄》、《聖學宗傳》、《王門宗旨》、《助道微機》、《四書宗旨》等。⁹歷來對周汝登的研究多集中在九諦九解之說，以明其無善無惡論¹⁰，或檢視其融佛涉禪的思想面向¹¹；另外則多關注《聖學宗傳》以說明周氏雜揉儒禪的學術史解釋觀點¹²。這些研究的確能對周汝登無善無惡的思想有更細膩的釐清，並對其融合儒釋的思想有所瞭解，實有相當貢獻。但檢視這些研究成果，筆者發現，前人似乎遺漏了周汝登相當重視的《四書》部分，而未對其《四書》專書—《四書宗旨》進行深

⁶ 黃宗羲言：「先生(周汝登)供近溪像，節日必祭，事之終身」，[清]黃宗羲著，沈芝盈點校：《明儒學案》，卷三十六，頁 853。

⁷ 參見彭國翔：〈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「明儒學案」相關問題之檢討〉，《清華學報》第 31 卷第 3 期(2001 年 9 月)，頁 339-374；呂妙芬：《陽明學士人社群—歷史、思想與實踐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3 年)，頁 241-242。

⁸ 周汝登自言其於王龍溪是「及門而未受業，受業而非及門矣」，意指周汝登曾聽聞王龍溪講學，不過當時未能領略其說，後來讀其會語方有所契悟，但此時王龍溪已逝世。此外，周汝登於文中稱呼王龍溪為「龍溪先師」。見[明]周汝登：《東越證學錄》，頁 431-432、497。

⁹ 參考張克偉：〈周汝登生明及其著述論略〉，《中國書目季刊》第 22 卷第 4 期(1989 年 3 月)，頁 53-62；劉哲浩：《周海門哲學思想研究》(臺北縣：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1 年)，頁 3-8。

¹⁰ 林洪兌：〈四有四無之辯的深入—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〉，《儒教文化研究》第 4 期(2004 年 2 月)，頁 149-159；鄭燦山：〈許敬菴、周海門九諦九解之辯〉，《國立編譯館館刊》第 25 卷第 2 期(1996 年 12 月)，頁 143-159；蔡仁厚：〈王門天泉「四無」宗旨之論辯—周海門「九諦九解之辯」的疏解(上)〉，《鵝湖》第 1 卷第 4 期(1975 年 10 月)，頁 11-20；蔡仁厚：〈王門天泉「四無」宗旨之論辯—周海門「九諦九解之辯」的疏解(下)〉，《鵝湖》第 1 卷第 5 期(1975 年 11 月)，頁 20-26；麥仲貴：〈附論：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〉，收入麥仲貴：《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1973 年)，頁 223-230；王湘齡：《許敬菴、周海門「九諦九解」義理研究》(桃園縣：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2 年)等。

¹¹ 黃文樹：〈泰州學派與禪宗思想〉，《樹德科技學報》第 1 卷第 1 期(1999 年 6 月)，頁 233-256；孫中曾：〈明末禪宗在浙東興盛之緣由探討〉，《國際佛學研究》第 2 期(1992 年 12 月)，頁 141-176；張克偉：〈論泰州王門學派對晚明思潮之影響〉，《齊魯學刊》第 9 期(1998 年)，頁 90-97 等。

¹² 嵇文甫：《左派王學》(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0 年)，頁 61-63；張君勱：《新儒家思想史》(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6 年)，頁 320、328；陳榮捷：《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6)，頁 355；許馨元：《周海門及其聖學宗傳研究》(臺北：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9 年)等。

入研究，實有缺憾。此書應是研究周汝登整體學術中，不可忽略的重要著作，因為周汝登對《四書》相當重視，認為《四書》能直截地傳達聖賢之道，為孔門傳道之書，¹³因此於生前最後幾年，將精力投注在《四書》的詮釋上，完成人生最後的著作《四書宗旨》，¹⁴代表其一生窮究《四書》的最後成果。而周汝登選擇於晚年撰作此書，也顯示他有意將一生的思想透過詮釋《四書》加以呈現，藉由《四書》來證成自己的學問，表明終生企慕大道的心志。由此可知《四書宗旨》在周汝登的整體學術中，佔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，若欲更完整深入地把握其學術內涵，必不能忽略此書的研究。《四書宗旨》除了在研究周汝登學術上相當重要外，在學術史上亦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，因為透過此書的研究，能觀察晚明的陽明學者如何理解、詮釋《四書》，其思想如何與經文進行融涉，對理解晚明的《四書》詮釋，尤其是陽明學派的部分有一定幫助。

但至目前為止，關於周汝登《四書宗旨》的研究，僅有佐野公治(1936-)〈周汝登の四書學〉¹⁵一文。此文透過《四書宗旨》來探討周汝登的《四書》學，獲致周氏在論述、詮釋《四書》上，具有當下悟得、對朱註的部分肯定、融通儒釋的解釋等特色。此文已大致觀察出周汝登詮釋《四書》的特性，卻未對詮釋下的義理內涵進行更深一層之研究，因此無法看出周氏窮究一生的《四書》理解為何，即其如何把握《四書》義理；此外，對周氏的思想如何與經文進行融涉，對經文解讀產生什麼影響，亦未予以探究。故本文欲在前人初步的研究基礎上更進一層，對《四書宗旨》進行更深入全面的探討，以瞭解周汝登詮釋《四書》的內容和策略；透過分析其中的義理內涵，以掌握周氏的《四書》理解，進而觀察周氏思想對經文理解產生的影響；並探討周氏詮解經文的方法，以瞭解其解經策略。希冀透過《四書宗旨》的研究，能達成以下幾個目的：第一，對周汝登的《四書》學行補強，完整呈現周氏詮釋《四書》的義理內涵與架構，並瞭解其解經方式；第二，透過此書，觀察一位陽明學者如何詮解《四書》，其思想如何與經文進行融涉，如何影響經文解讀，以對陽明學者的《四書》詮釋有所瞭解；第三，綜合以上成果，呈現周汝登《四書宗旨》在學術史上具有的意義和價值。

¹³ 周汝登指明《四書》的微妙處、切實處、直截處；視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為孔門傳道之書；《論語》包含《六經》之要；讚揚《孟子》載有曠絕千古之識。以上依序見於周汝登：《東越證學錄》，頁 302-304、483、265、281。

¹⁴ 依《四書宗旨》的序文可知周汝登是在人生最後六年完成此書，詳細論述見本章「第三節的研究範圍」。

¹⁵ [日]佐野公治：《四書學史の研究》(東京都：創文社，昭和 63 年(1988))，頁 329-346。

第二節 文獻回顧

至目前為止筆者寓目所見，有關周汝登的研究成果，依內容性質和偏向，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：

第一類，對周汝登的整體思想進行介紹，包括著作、思想概述和學派定位：首先，在著作方面，有張克偉〈周汝登生平及其著述論畧〉¹⁶，對周汝登絕大部分著作的著錄情形、版本與內容進行介紹，搜羅詳盡，可見作者用心。而在周汝登的所有著作中，則以《聖學宗傳》受到最多關注和研究，如陳榮捷《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》¹⁷，評周汝登的《聖學宗傳》屬王學立場，言此書「學術精神不足，而門戶之見有餘，不可不謂學術史之大不幸也。」¹⁸張君勳《新儒家思想史》¹⁹，將周汝登定位為公然宣揚禪學思想的泰州人物，在學脈傳承圖表中，把耿定向(耿定向)²⁰、王龍溪與周汝登做師承繫聯；評論周汝登的《聖學宗傳》是「以禪者觀點解釋中國所有先賢，這部書雜揉了佛家和儒家」²¹、「是以佛家觀點解釋的中國哲學史」²²。嵇文甫《左派王學》，認為《聖學宗傳》把經傳用禪意解之，解得「洞然豁然」，是「信手拈來，一片禪機」²³，代表思想的解放，打破儒釋界限。許馨元《周海門及其聖學宗傳研究》²⁴，主要對周汝登《聖學宗傳》一書的內容進行探討與分析。其次，概述周汝登思想方面的研究，有荒木見悟〈周海門の思想〉²⁵一文，分列五點：首先談周汝登與王龍溪的師承關係，其次探討周氏對無善無惡論的提倡，接著說明周氏與釋者憨山德清等人的交游，再則論述周氏的社會觀與思想史觀，最後敘述周氏思想的承繼發揚者陶望齡。岡田武彥《王陽明與

¹⁶ 張克偉：〈周汝登生明及其著述論畧〉，《中國書目季刊》第22卷第4期(1989年3月)，頁53-62；但文中未將周汝登的《佛法正輪》二卷納入，此書可見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編：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》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；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)，第33冊，頁105-133。

¹⁷ 陳榮捷：《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》，頁319-323、325-328。

¹⁸ 陳榮捷：《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》，頁355。

¹⁹ 張君勳：《新儒家思想史》，頁311-328、354-355。

²⁰ 按：張君勳《新儒家思想史》頁316的「耿定性」是誤名，應作「耿定向」。

²¹ 張君勳：《新儒家思想史》，頁320。

²² 張君勳：《新儒家思想史》，頁328。

²³ 嵇文甫：《左派王學》，頁61-63。

²⁴ 許馨元：《周海門及其聖學宗傳研究》(臺北：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9年)。

²⁵ [日]荒木見悟：《明代思想研究》(東京都：創文社，昭和47年(1972))，頁227-264。

明末儒學》²⁶，對周汝登思想的論述如下：其一，周氏的「現成」本體觀導致其「當下承當、當下受用、當下之信」的工夫論；其二，周氏「以渾淪為宗，排斥分疏」²⁷的主張，顯示在對「悟修」、「頓漸」、「心知」的看法上；其三，周氏「貴自得」，在為學方面強調「自得為學之入門究竟」²⁸、「學即覺」，「覺」即是「當下自身受用、直承悟入」²⁹和「本體的默識自得」³⁰；其四，周氏雖提倡自得，卻未廢棄讀書窮理，其謂讀書在於能「通微」、「默契微旨」，此「微旨」即是「超越言詮的真體之旨」³¹；其五，周氏強調「貴自信」，要求直信自我，將天地萬物、仁義德目皆歸諸「自身」，是吾心自得；其六，分析周氏〈九解〉的無善無惡論；其七，論述周氏主合不主分、不拘泥界線的儒釋主張。今井宇三郎等人在《陽明學大系第七卷・陽明門下(下)》中撰有〈周海門〉³²一文，分別對周汝登的學統、無善無惡的主張、與佛者的交流、社會思想等進行介紹，但文中敘述多是參考援引荒木見悟《明代思想研究》和岡田武彥《王陽明と明末の儒学》的研究成果。劉哲浩《周海門哲學思想研究》³³，介紹周汝登的本體論、性論、無善無惡論、惟心論、心上工夫論等，大致已提點出周氏思想中較重要的概念，並進行哲學式的討論與剖析。最後，論及周汝登學派定位的研究，則有呂妙芬在〈浙中地區的講學活動〉³⁴中，說明周汝登在晚明浙中一地是重要的王學傳播者：「當時學者確實以周汝登為王畿之後浙中最重要的陽明講學領袖」³⁵，指明浙中一地是「王陽明—王龍溪—周汝登」的王學脈絡。彭國翔分別撰有〈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《明儒學案》相關問題之檢討〉³⁶和〈周海門學派歸屬辨〉³⁷二文，後文是前文的簡要版，文中並不同意黃宗羲在《明儒學案》中將周汝登視作羅近溪的弟子而歸入泰州學案，分別從地域、思想傳承和自我認同提出證明，說明周汝登應是王龍溪的

²⁶ [日]岡田武彥著，吳光等譯：《王陽明與明末儒學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)，頁181-193、163-167。

²⁷ [日]岡田武彥著，吳光等譯：《王陽明與明末儒學》，頁183。

²⁸ [日]岡田武彥著，吳光等譯：《王陽明與明末儒學》，頁185。

²⁹ [日]岡田武彥著，吳光等譯：《王陽明與明末儒學》，頁183。

³⁰ [日]岡田武彥著，吳光等譯：《王陽明與明末儒學》，頁183。

³¹ [日]岡田武彥著，吳光等譯：《王陽明與明末儒學》，頁186。

³² [日]宇野哲人、安岡正篤監修，荒木見悟等編：《陽明學大系第七卷：陽明門下(下)》(東京都：明德出版社，昭和49年(1974))，頁44-58。

³³ 劉哲浩：《周海門哲學思想研究》(臺北縣：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1年)。

³⁴ 呂妙芬：《陽明學士人社群—歷史、思想與實踐》，頁231-249。

³⁵ 呂妙芬：《陽明學士人社群—歷史、思想與實踐》，頁242。

³⁶ 彭國翔：〈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「明儒學案」相關問題之檢討〉，《清華學報》第31卷第3期(2001年9月)，頁339-374。

³⁷ 彭國翔：〈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辨〉，《浙江社會科學》第4期(2002年7月)，頁104-109。

弟子，應當歸入浙中王門。

第二類，闡述周汝登的心學思想，包括九諦九解和無善無惡論：如張君勸《新儒家思想史》³⁸，說明周汝登深受王龍溪影響並重視無善無惡說，其回應許孚遠的〈九解〉充滿禪學色彩，以此作為禪學深入陽明學的例證；嵇文甫《左派王學》³⁹，認為周氏的無善無惡論發揮妙義，是超越善惡的至善義。程發軔《理學概要》⁴⁰，論述周汝登的此心自得則無入而不自得，和世界的缺陷、滿足皆在一心的主張。王湘齡《許敬菴、周海門「九諦九解」義理研究》⁴¹，則對「九諦九解」的思想背景，所含的本體論、工夫論、四有四無進行分析、論述。彭國翔在《良知學的展開—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》⁴²中論及周汝登的部分，主要可分成三點：第一，周汝登之所以會闡揚無善無惡論與其對禪宗思想的吸收有關；第二，周汝登對生死問題的看法是「生死俱是心。心放下，有甚生死可了。」將生死解脫之道歸諸於主體的自我意識和當下對生命意義的覺悟；第三，周汝登強調良知心體的自覺自信和「信能及者，當下即是」的主張，是屬儒學宗教化的形態。楊正顯《陶望齡與晚明思想》⁴³，對周汝登的九諦九解之辨和良知了生死的看法進行論述。呂妙芬〈浙中地區的講學活動〉⁴⁴，解說周汝登的無善無惡義，認為周氏〈九解〉充分發揮王龍溪「無善無惡」之旨，在當時造成重大影響。岡田武彥〈明末儒學的發展〉⁴⁵，說明周汝登信奉王龍溪的無善說(四無說)和強調自我的現成。林洪兌〈四有四無之辯的深入—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〉⁴⁶，對〈九諦九解〉進行分析、論說，認為周汝登的無善無惡說並不排斥為善去惡的工夫；鄭燦山〈許敬庵、周海門九諦九解之辯〉⁴⁷，透過對九諦九解原文作疏解，說明周、許二人在思路、觀點上的歧異導致雙方對心體的瞭解截然不同，周氏主

³⁸ 張君勸：《新儒家思想史》，頁 311-328、354-355。

³⁹ 嵇文甫：《左派王學》，頁 59-63、85。

⁴⁰ 程發軔：《理學概要》(臺北：中正書局，1971年)，頁 157。

⁴¹ 王湘齡：《許敬菴、周海門「九諦九解」義理研究》(桃園縣：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2年)。

⁴² 彭國翔：《良知學的開展：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》，頁 471-552。

⁴³ 楊正顯：《陶望齡與晚明思想》(臺中：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0年)。

⁴⁴ 呂妙芬：《陽明學士人社群—歷史、思想與實踐》，頁 231-249。

⁴⁵ [日]岡田武彥著，屠承先譯：〈明末儒學的發展〉，《哲學譯叢》第 3 期(1989年 5 月)，頁 73-77。

⁴⁶ 林洪兌：〈四有四無之辯的深入—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〉，《儒教文化研究》第 4 期(2004年 2 月)，頁 149-159。

⁴⁷ 鄭燦山：〈許敬庵、周海門九諦九解之辯〉，《國立編譯館館刊》第 25 卷第 2 期(1996年 12 月)，頁 143-159。

張的無善無惡是屬境界義、工夫化境義；而許氏則是從實有義立場出發得出心體本善，故必須為善去惡；作者最後又從個性、成學經歷來探討形成此理解差異的原因。蔡仁厚〈王門天泉「四無」宗旨之論辯—周海門「九諦九解之辯」的疏解(上)(下)〉⁴⁸，認為周汝登的〈九解〉實能掌握四無說的真切處，雖不免疏闊欠分明，卻能倡明天泉宗旨；古清美在〈王陽明致良知說的詮釋〉⁴⁹中，認為周汝登的〈九解〉已完全悖離王陽明的良知之教，將無善無惡之論帶往空寂玄虛，使儒家與佛老的界限混淆不辨。麥仲貴〈附論：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〉⁵⁰一文，討論兩者之說，但以殊不易言而未下論斷。步近智〈晚明時期儒學的演變與影響〉⁵¹，探討周汝登與許孚遠間的論辯，認為周汝登、管志道等人把本體與工夫分離為二，許孚遠、馮從吾等人視本體與工夫是合一的。步近智所見與其他人觀點不同，顯見辨析周汝登的心學內涵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；因此若能回歸經典詮釋的研究，當可深究精微、有助釐清。

第三類，將論述集中在周汝登的佛釋關係與融佛思想上：如黃文樹〈泰州學派與禪宗思想〉⁵²一文，說明周汝登與當時佛教大師憨山德清、雲棲株宏、達觀真可都有交情；治學上以會合儒釋而貫通之為職志，為晚明三教合一說的提倡者。黃文樹的另一篇文章〈王門弟子與佛教〉⁵³，論及周汝登的部分大體與上述一致，言周氏與佛教合流，導致其儒學思想產生質變。孫中曾〈明末禪宗在浙東興盛之緣由探討〉⁵⁴，認為周汝登破除名相、直指本質的論道方式，提供儒釋道三教會通的基礎，此外，他主張無善無惡的本體論和以簡易直截為工夫的思想，皆與禪宗有若干契合相通之處，而他又與湛然澄等佛門人士交游論學，以上種種因素皆導致禪宗得以進入浙東，形成晚明浙東的宗風大盛。張克偉〈論泰州王門

⁴⁸ 蔡仁厚：〈王門天泉「四無」宗旨之論辯—周海門「九諦九解之辯」的疏解(上)〉，《鵝湖》第1卷第4期(1975年10月)，頁11-20；蔡仁厚：〈王門天泉「四無」宗旨之論辯—周海門「九諦九解之辯」的疏解(下)〉，《鵝湖》第1卷第5期(1975年11月)，頁20-26。

⁴⁹ 古清美：〈王陽明致良知說的詮釋〉，收入古清美：《明代理學論文集》(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0年)，頁89-139。

⁵⁰ 麥仲貴：〈附論：周海門之九解與許敬菴之九諦之辯難〉，收入麥仲貴：《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1973年)，頁223-230。

⁵¹ 步近智：〈晚明時期儒學的演變與影響〉，《中國史研究》1989年第1期(總第41期)，頁144-152。

⁵² 黃文樹：〈泰州學派與禪宗思想〉，《樹德科技學報》第1卷第1期(1999年6月)，頁233-256。

⁵³ 黃文樹：〈王門弟子與佛教〉，《正觀雜誌》第29期(2004年6月)，頁137-214。

⁵⁴ 孫中曾：〈明末禪宗在浙東興盛之緣由探討〉，《國際佛學研究》第2期(1992年12月)，頁141-176。

學派對晚明思潮之影響》⁵⁵，說明周汝登的思想是儒佛兼攝：「以真心一元論融合《金剛》、《般若》經的性空緣起、一切皆空說的正統禪宗與儒家學說融合以完成其學說體系」⁵⁶。呂妙芬〈儒釋交融的聖人觀：從晚明儒家聖人與菩薩形象相似處及對生死議題的關注談起〉⁵⁷，談到周汝登與晚明部分理學家一樣，將生死議題納入儒學意涵，並以修養工夫去對治生死。對於儒釋的交融，周汝登更為開闊的態度，當有助於深化儒學之內涵。

綜上所論可知，關於周汝登思想的研究，多從九諦九解說和無善無惡論出發，以論析其心學思想，或闡述周氏融佛攝禪的部分，大致上勾勒出周氏的整體思想樣貌，但在某些關鍵處仍有待更細膩、深入地釐清和研究。如周氏思想中的「心體」除了具有「無善無惡」境界義外，還有沒有其他內涵？其次，在此心體意義下的修養工夫又是如何？即周氏主張透過什麼具體工夫去識察無善無惡的心體，進而透過心體與工夫的配合以為學成道？此部分屬儒學的關鍵性問題，然前人的研究尚未深入，故本文將於此處特別著力。至於討論周汝登《四書宗旨》的相關文獻僅有佐野公治〈周汝登の四書學〉⁵⁸一文，此文透過《四書宗旨》來探討周氏的《四書》學，指出特色在以當下悟得的視角進行經文解讀、對助詞進行解釋、援引漢宋注疏、對朱註有部分肯定、以禪的機鋒進行解釋等。然而以上這些特點較屬於詮釋方法和特色，對《四書宗旨》的義理內涵尚未進行全面探討，故無法完整理解周氏的《四書》觀點和成就。故本文擬對《四書宗旨》進行深入研究，架構周汝登關於《四書》的義理內涵，觀察周氏如何理解《四書》和其中的重要概念，以及其思想如何對經文的理解與詮釋產生影響，進而彰顯《四書宗旨》在學術史上的意義與價值。

第三節 研究範圍、方法與章節說明

(一)研究範圍

⁵⁵ 張克偉：〈論泰州王門學派對晚明思潮之影響〉，《齊魯學刊》第9期（1998年），頁90-97。

⁵⁶ 張克偉：〈論泰州王門學派對晚明思潮之影響〉，《齊魯學刊》第9期（1998年），頁95-96。

⁵⁷ 呂妙芬：〈儒釋交融的聖人觀：從晚明儒家聖人與菩薩形象相似處及對生死議題的關注談起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32期（1999年12月），頁165-207。

⁵⁸ [日]佐野公治：《四書學史の研究》，頁329-346。

本論文以周汝登的《四書宗旨》為研究範圍，此書是周氏詮釋《四書》的著作。根據門人鄭重耀(?-?)寫於崇禎己巳年(1629)的書前序文〈四書宗旨紀事〉，可知此書的撰作緣由與經過：「耀(鄭重耀)自甲子歲後日侍吾師，諄諄提耳，隨以平日所聞四子微宗指示。耀曰：『吾師倦倦接引後學，著解發宋儒所未發。盍梓是編即舉子業，引入聖域不更捷乎！』師曰：『此予夙願，第遺漏尚多，還須一緝理耳。』今年春，師乃纂補裁定手書一秩，於浹月間竣事，題曰《四書宗旨》，真完璧也，即絕筆也，嗚呼！吾師秘密全呈，重開聖賢生面，讀者會通其妙，以洗臭腐陳詮。」⁵⁹文中的「甲子歲」應是「明熹宗天啟四年」(1624)，而「四子」即是《四書》。由序文可知周汝登相當重視《四書》，詮解《四書》以引人進入聖賢之道，是他一直以來的「夙願」，而《四書宗旨》正是此願望的具體成果。天啟四年(1624)，七十八歲的周汝登對門人後學的教育即是闡發《四書》義理，其解說與宋儒不盡相同，發前人所未發，此時講學《四書》的內容或講義，正是形成《四書宗旨》的初稿；後來，周汝登再將平日闡示的《四書》內容或講義加以刪補整理，終在崇禎己巳年(1629)，生前最後一年，完成「纂補裁定手書一秩」，題名為《四書宗旨》。可見《四書宗旨》從平日的闡學內容到整理成書，共經六年的時間，是在周汝登人生的最後六年完成，不僅顯示周氏對《四書》相當重視，亦可說周氏有意將其一生的思想透過詮釋《四書》來呈現。此外，周氏以「宗旨」二字命名此書，是陽明學者受禪宗影響，以此詞標舉學問大要的普遍方式；如王陽明常要弟子懂得學問的「宗旨」處，或抓住其言的要緊處：「若不知立言宗旨，只管說一個兩個，亦有甚用？」⁶⁰又說「此須識我立言宗旨」⁶¹、「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」⁶²；在黃宗羲的《明儒學案》中，亦處處可見「宗旨」之語，如「大凡學有宗旨，是其人之得力處，亦是學者之入門處。天下之義理無窮，苟非定以一二字，如何約之，使其在我。故講學而無宗旨，即有嘉言，是無頭緒之亂絲也。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，即讀其書，亦猶張騫初至大夏，不能得月氏要領也。」⁶³顯示「宗旨」二字是學問提綱挈領的大要標舉，它成為明代中晚期，流轉於宗

⁵⁹ 周汝登：《四書宗旨》(臺北：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，1978年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[明]崇禎己巳年(1629)鄭重耀刊本)，頁239-240。案：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將[元]張存中《四書通證》與周汝登《四書宗旨》合成一書，故《四書宗旨》在此書的頁數是235-672頁。

⁶⁰ 王守仁撰，吳光等編校：《王陽明全集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)，頁4。

⁶¹ 王守仁撰，吳光等編校：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96。

⁶² 王守仁撰，吳光等編校：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121。

⁶³ 黃宗羲著，沈芝盈點校：《明儒學案》，卷三十六，頁14。

王學者間的重要概念，亦反映陽明後學追求簡易直捷的學風傾向。⁶⁴由此可見，周氏取《四書宗旨》之名，應是有意透過陽明學的思想來掘發、呈顯《四書》要義，指示義理的核心緊要處。

在版本方面，今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「明崇禎己巳年(1629)鄭重耀刊本」，內容和排序分別是「大學」、「中庸」、「上論」、「下論」、「上孟」、「下孟」，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因內容較多而分成上下卷；在內容方面，並無《四書》經文，皆是篇章名加詮釋文字，如《大學》部分的開頭是〈天命章〉，後一行就是周氏的詮釋文字，接著是〈時中章〉和此章的詮釋。民國六十七年，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根據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「明崇禎己巳年(1629)鄭重耀刊本」影印出版，本文將採此影印本進行研究。

(二)研究方法

檢視前人關於周汝登的研究成果，幾乎都是以理學或陽明心學的角度切入，對周氏思想或著作進行研究，以說明其心學價值和學術定位，卻忽略了從「經學」角度去檢視周氏的整體學術，因而遺漏了周氏相當重要的經典詮釋作品—《四書宗旨》。故本文欲從前人未注意的「經學史」角度切入，發掘周氏《四書宗旨》在經典詮釋上的內涵與價值，期以呈顯此書在學術史上的意義。

本文以周汝登的《四書宗旨》為研究範圍，首先採用文獻分析法對此書的《四書》論述和詮釋進行細密深入地閱讀、理解，接著透過歸納整理與整體分析，提點出周汝登在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中，談論最多的核心概念或議題，以進行深入的分析、條理；而透過核心概念的內涵梳理和議題的組織，呈顯周氏的《四書》義理以架構出《四書》體系；在此過程中，亦觀察周氏思想在理解與詮釋經文上產生如何的影響，並掌握其《四書》方面的獨特思考理路與詮釋方式；最後，再將周汝登的《四書宗旨》放入學術史的脈絡中，掘發其價值。另外有一點必須說明，即在《四書》的研究順序上，基本按照《四書宗旨》中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的排序進行，周氏並未在書中說明此排序的用意，但推測應與當時的書商刊刻習慣有關⁶⁵；因此本文將在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

⁶⁴ 參見王汎森：〈明末清初思想中之「宗旨」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94卷第4期(1997年4月)，頁1-4。

⁶⁵ 陳逢源老師：「就以朱熹撰成《四書章句集注》之後，歷來有關四書的排列，仍有諸多不同

《孟子》這樣的排序下，以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合為一章，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合為一章來進行研究，因為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的內容屬系統性的義理論述，因此透過周氏的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詮釋，可先大致掌握其關於天道、人性等基本而重要的詮釋架構；這對於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較鬆散的語錄式論述，會有深入精準地把握和理解。

在研究過程中，除了周汝登的《四書宗旨》為重要的第一手文獻資料外，周氏的其他著作如《東越證學錄》、《聖學宗傳》、《王門宗旨》等，凡載有相關的《四書》論述，對釐清和理解《四書宗旨》有所幫助，或可考見其思考之軌跡者，也將依需要納入參考、運用；另外，《四書》學的相關著作如鄭玄、孔穎達的《禮記注疏》，何晏、邢昺的《論語注疏》，趙岐、孫奭的《孟子注疏》，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等宋、明諸儒詮解《四書》的成果，皆是本論文進行義理內涵探究、釐清，或思想淵源考察等過程中，需要援據參考的文獻；期望透過以上資料的綜合運用，能使周汝登《四書宗旨》的內涵和價值掘發而出。

本文以周汝登《四書宗旨》為研究主題，其章節安排如下：

第一章「緒論」，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，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檢討，然後說明本文的研究範圍、方法和章節安排。

第二章「周汝登生平、著作與學術思想」，首先概述周汝登的生平，其次介紹包括《四書宗旨》在內的所有著作；最後論述周氏的學術思想，包含其本體論和工夫論，並探討周氏對佛釋的看法，以對其整體思想有深入的掌握。

第三章「周汝登《四書宗旨》—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部分」，探討周汝登如何理解、詮釋《大學》的「明德親民」、「格物」、「誠意正心」等重要概念，賦予《中庸》的「天、性、道、教」、「致中和」與「誠」如何的義理內涵；以此發現周汝登詮釋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義理的重要核心為何。

的安排情形，最常見是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：包括真德秀《四書集編》、趙順孫《四書纂疏》、胡炳文《四書通》、詹道傳《四書纂箋》、蔡清《四書蒙引》、呂柟《四書因問》等，據《四書全書總目》『書肆刊本，以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篇頁無多，併為一冊，遂移《中庸》於《論語》前』的說法，其中純就刊刻編輯方便，實在無關宏旨」見陳逢源老師：《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138-139。

第四章「周汝登《四書宗旨》—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部分」，透過歸納、分析以瞭解周汝登對《論語》中「仁」、「禮」的內涵理解和工夫實踐，並探討其對孔子與弟子為學方面的看法；在《孟子》部方，將觀察周汝登如何闡發孟子的性善論、四端說和修養工夫等，在論「性」、「知言養氣」上，賦予如何的獨特意涵。

第五章「周汝登《四書宗旨》的特色與學術史意義」，透過上述的整理、分析，得以歸納出周汝登使用的詮釋方法，和《四書宗旨》的整體義理聯繫，以及周汝登用以貫穿《四書》詮釋的核心思想，進而得出此書在學術史上的意義。

第六章「結論」，綜論以上的研究成果，並檢討本論文的不足之處，並提出可再發展的研究空間。

期透過以上六章，瞭解身為晚明重要的陽明學者的周汝登，是如何運用其本身思想去理解、詮釋《四書》，呈顯此書在晚明《四書》學史上的意義和價值。